

# AIGC 赋能下广州红色文化品牌青年传播策略体系构建与教学 启示研究

祁俊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 围绕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在青年群体中视觉呈现与价值认同之间存在的落差, 本文以 AIGC 介入视觉传达课程教学为切入点, 探讨其在提升青年参与度与表达丰富性方面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标志设计》《书籍设计》《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三门课程为行动研究场域, 围绕品牌视觉系统构建、主题叙事设计与跨平台内容原型展开教学实践, 并结合教学过程记录与学生作业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形成面向青年媒介语境的课程实施框架: 提出微叙事与在地符号结合的视觉表达方式, 构建可追溯的 AIGC 内容生成与真实性控制流程, 完善“学生共创—线上展示—反馈改进”的课堂组织结构, 并总结质量与伦理评价要点。研究为 AIGC 赋能红色文化品牌相关课程建设提供实践经验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 广州红色文化; 青年传播; 视觉传达设计; 生成式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 2025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常规课题 (共建) 项目《AIGC 赋能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形象视觉创新与青年群体传播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 2025GZGJ23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49

## Constructing a Youth-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System for Guangzhou

### Red Culture Brands under AIGC: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Qi Jun<sup>1</sup>

<sup>1</sup>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0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gap between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value recognition of Guangzhou red culture brands among young audienc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of AIGC into visu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to enhanc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expressive diversity. Using three courses—*Logo Design*, *Book Design*, and *Traditional Art and Modern Design*—as action research contexts, the study explores curriculum practices related to brand visual system construction, thematic narrative design, and cross-platform content prototyping. Teaching process records and student work were analyzed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a curriculum framework tailored to youth media contexts. The framework proposes a visual expression approach combining micro-narratives with local cultural symbols, establishes traceable AIGC content generation and authenticity control processes, implements a “student co-creation—online presentation—feedback revision” classroom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summarizes quality and ethical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findings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guidance for integrating AIGC into red culture brand-related courses.

**Keywords:** Guangzhou red culture; youth communic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者简介:** 祁俊(1997—),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文创设计;

**通讯作者:** 祁俊

## 一、绪论

近年来，广州持续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但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仍存在“可见但不入心”的问题：视觉表达偏纪念化、宣讲化，导致日常媒介语境中的距离感；同时，符号与叙事同质化易引发审美疲劳，难以在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注意力竞争中形成有效触达。与之相对，青年视觉接受方式正转向图像化、平台化与参与化——图像不仅承载信息，也承载情绪与身份认同；平台算法重塑观看路径；青年更倾向通过二创、拼贴、模因化与视觉再叙事参与意义生产。由此，红色文化品牌若仍停留在单向传播与固定语态，往往难以进入青年的日常传播链。

AIGC 作为新型内容生产工具，具备快速生成、多方案迭代和风格具备快速迁移等优势，在红色文化视觉传播中提，它使设计过程从单一的结果导向逐渐转向探索式过程，为青年从被观看者转向参与共创者、策展者与再阐释者创造了技术条件。但与此同时，AIGC 介入红色文化内容生产也带来历史真实性、文化准确性、风格趋同与伦理治理等风险，亟需一套可执行的质量控制与传播策略体系。

现有研究空白主要体现在三点：（1）关于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讨论多停留在宏观叙事与媒介渠道层面，缺少从“视觉语态—平台机制—青年参与”联动结构出发的策略框架；（2）AIGC 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研究多强调效率与技术展示，对“真实性/准确性可控”的评价指标、流程规范与伦理边界讨论不足；（3）以高校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为场域的证据较少，尚缺乏将课堂共创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品牌传播策略体系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AIGC 赋能下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青年传播策略体系构建”为目标，选取笔者所任课程班级（主要为专升本第三学期学生），关注其红色文化认知与意义建构、媒介使用行为、AIGC 工具接受度与内容共创意愿，并将思政教育、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红色文化设计与 AIGC 教育应用开发者等协同主体纳入分析，呈现多主体共创机制。

本文聚焦三个研究问题：

RQ1: AIGC 介入红色文化学习与传播后，青年学生的意义建构与认知机制呈现何种特征？

RQ2: 如何在提升传播效果的同时，实现历史真实性、文化准确性与内容质量的可控，并形

成适配广州在地红色资源与岭南文化特征的伦理与质量评估框架？

RQ3: 如何引导青年从接受者转化为共创者、品牌设计者与再阐释者，其参与路径与实现机制为何？

研究方法采用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sup>[1]</sup>，以“课堂问题—方案设计—实施—反馈—迭代”为基本循环。研究场域覆盖《标志设计》、《书籍设计》、《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三门课程（合计学时与周次以课程进度表为准），组织学生在 AIGC 辅助下完成品牌视觉系统、主题视觉叙事与跨平台内容原型<sup>[2]</sup>。并通过课堂与课程任务获取青年认知与使用数据，结合生成内容的质量评估与传播表现（如叙事一致性、在地符号适配度、真实性风险点、平台传播语态匹配度等）进行分析迭代，最终沉淀“策略体系”。以课程教学实践为场域，揭示 AIGC 介入后青年在红色文化视觉学习与传播中的意义建构机制<sup>[3]</sup>；并将“课堂共创—生成控制—再设计—传播适配”的流程提炼为可复制的教学与传播策略模型；同时提出面向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视觉传播的 AIGC 内容生产规范与评估框架。

## 二、AIGC 介入视觉传达课堂的实践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考虑到学生终端设备性能差异、软件采购与维护预算有限，以及“课堂集中教学+课后分布式创作”的混合场景需求，本研究对多款主流 AIGC 工具进行比选。评价维度涵盖可用性、易用性、跨平台兼容性与综合成本，并综合考虑青年群体的工具偏好与使用习惯。综合比较后，豆包 AI 与即梦 AI 在普惠可达性、轻量化接入与课堂任务适配度方面表现较好，因而被确立为核心辅助工具。该组合不是被动的资源妥协，而是一项面向“普惠覆盖+稳定协作”的教学设计决策，旨在以低门槛保障更广参与、以高适配支持更稳定的创作迭代。

工具选型的关键依据在于其对复杂教学情境的包容性与可扩展性：两者均可覆盖 Windows、macOS 及主流移动端，降低硬件门槛，使学生可基于电脑、平板或手机完成基础生成、迭代与优化；其图形化界面与提示词交互降低学习曲线，促使学生将更多认知资源投入创意构思、视觉叙事与文化要素转译，而非软件排障。为避免“只生成不设计”，课程将 AIGC 定位为“概念探索与原型生成”的工具，并通过过程性证据与再设计要求，

将生成输出纳入可训练、可评价、可追溯的设计闭环。

### (一) 标志设计课程中的 AIGC 辅助实践

从行业需求看,标志设计岗位正向“视觉能力+技术协作<sup>[4]</sup>+策略理解”的复合能力结构迁移。除形式控制与审美表达外,用人方更关注设计师对 AIGC 工具的协作能力,以及对 AI 产出的筛选、诊断与再设计判断力。AIGC 能够提升概念探索效率并支持多方向迭代,但其输出仍需要人工完成语义校准、品牌一致性控制与差异化加工。因此,课程培养应以 AIGC 为效率工具、以品牌逻辑为约束框架,重点训练“需求理解—概念生成—方案评估—再设计优化—交付呈现”的闭环能力,避免学生停留在生成与拼接层面。

标志设计课程处于从“以传统工具与形式训练为中心”向“以 AIGC 支持的概念生成与迭代优化”转型阶段。AIGC 虽能在短时间输出多方案草图并支持快速迭代,但也带来两类教学风险:其一,学生将生成结果等同于设计能力,弱化需求分析、语义校准与方案论证;其二,训练停留在“生成—筛选”的浅层操作,难以支撑真实项目所要求的系统化设计思维与可交付能力。面向专升本学生群体(基础差异较大),在 48 学时且任务密度较高的情境下,如何将 AIGC 纳入可训练、可评价的流程,并实现从概念到落地的能力闭环,是课程改革的关键。

课程采用“课堂讲述+单个辅导+项目实践”的混合教学组织,以真实市场项目为主线构建人机协作流程,将 AIGC 定位为“概念探索与原型生成”的工具,而非替代性创作主体。能力目标分为三层:①形式控制(构成、比例、可读性、识别度);②策略与逻辑(需求转译、品牌一致性、差异化论证);③AIGC 素养(提示词构建、生成结果评估、再设计优化与规范使用)。评价方式以过程性证据为主,强调设计简报、方向推导、迭代记录与最终交付物一致性,避免仅以最终视觉效果衡量学习结果。

课程共 48 学时(45 分钟/学时),班级规模 32-35 人,按“概念—策略—技法—落地”四阶段连续推进,形成可复制的训练路径第一阶段(概念建构):以命题短练完成“概念—形式”快速映射,AIGC 用于关键词驱动草图生成与风格对比,学生需完成形式归类、构成拆解与再设计改写,产出命题草图集与设计说明;第二阶段(策略建立):以真实项目推进资料梳理、受众与场景界

定、核心价值提炼与关键词体系构建,形成设计简报。AIGC 用于概念扩展与多方向草案生成,但以“三维筛选”约束:语义一致性、品牌适配性、差异化;第三阶段(技法巩固):围绕图形标/字标/组合标与平台适配训练比例、留白、可读性与识别度,AIGC 用于变体生成与风格测试,但必须以网格修正、结构精炼与应用检验完成人工再设计;第四阶段(交付落地):按“定稿—规范—应用—呈现”完成闭环,包括标准制图、色彩/字体规范、最小尺寸与禁用规则、社媒与物料触点适配,以及提案文档与路演表达。AIGC 主要用于应用场景快速模拟与多版本对照,但交付以人工控制的一致性与可执行性为准。

在 AIGC 介入后,学生对广州红色文化符号的理解呈现“加速—偏差”并存,其根源在于模型的模式生成机制与红色符号的历史语境、价值指向之间存在张力<sup>[5]</sup>。一方面,“加速”主要体现在标志设计学习链路被显著压缩:在课程的中文标志、英文标志与以周年庆典为主的数字标志设计训练中,AIGC 能够依据你设定的命题(如“学校 60 周年庆典数字标志”,并延展到“未来学校升级为一本院校的情境设想”)快速生成多组构图方案、字体结构、数字“60”的组合逻辑与风格变体,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命题理解到形式原型的迭代;低门槛操作降低初学者进入成本,提升早期参与度;多风格样例也扩展了学生对“数字标志”可行表现路径的认识,提高试错效率,使课堂讨论更容易从“做不出来”转向“为什么这样做更恰当”。另一方面,“偏差”则更易在“红色符号的意义层”发生:由于生成依赖统计相关而非史实与在地经验理解,学生容易把“红色”简化为一种视觉情绪或通用庆典语汇,把广州在地的红色文化符号、学校自身的历史叙事与群体记忆,降格为可拼贴的装饰性素材;在你观察到的现象中,恰逢学校 30 周年时,学生方案大量集中于“红色帆船/轮船”以及若干广东地域元素——这类表达一方面说明纪念语境会自然推高“红色”与“航行/奋进”隐喻的使用频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当符号缺少史料支撑与语境论证时,容易滑向套模板式的象征(把“红色+船+地域元素”当作万能解),从而造成叙事被泛化<sup>[6]</sup>、情感认同被同质化;同时,训练数据中的主流庆典视觉范式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刻板路径,导致作品风格趋同、地方性与学校独特性被稀释。因此,教学上需要将 AIGC 严格定位为“概念探索与原型生成”的工具,而不是意义生产的替代者:在数字标志命题(学校 60 周年

庆典+未来升格情境)进入生成阶段之前,先以史料/校史研读与在地观察建立“叙事底座”,明确学校与广州语境下可被调用的红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指向;生成之后,以符号学核验与语境对照作为硬性约束,要求学生对AI草案逐项完成“语境核验—价值论证—再设计”:说明为何选用红色及其对应的历史与情感依据、为何使用帆船/轮船隐喻及其与学校发展愿景(尤其是“一本院校”设想)的关联、广东元素如何从“装饰”转为“叙事证据”,并通过字体系统、构图逻辑与周年数字语法的再组织,形成具有差异化识别度与意义准确性的最终方案。以此形成可操作的人机协作路径:用AIGC提升效率,用研究与论证守住语境与价值的准确性。

## (二)书籍设计课程中的 AIGC 叙事与形式探索

书籍设计涵盖开本、纸张、字体与版式、装订工艺与印刷流程等整体设计工作。AIGC的加入改变了传统以设计师经验与直觉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使封面、版式与图像生成进入“多方案快速迭代”的算法驱动模式。其积极意义在于:缩短概念探索周期、提升系列化资产生成效率;潜在风险在于:算法偏好导致的美学趋同<sup>[7]</sup>叙事模板化与文化语境稀释<sup>[8]</sup>。因而,课程的关键不在于“更快生成”,而在于通过叙事结构与形式控制,把AIGC纳入“内容理解—叙事建模—形式推演—校准修订—跨媒介延展”的学习闭环,从而平衡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

课程以“红色基因传承”与“设计美学演进”为主线,构建“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素养提升”的三维目标。教学将红色叙事分解为可操作的三类任务:①史料与语境理解(阶段精神与视觉母题);②叙事结构搭建(时间线/空间线/人物线);③形式策略落地(字体、网格、色彩与图像处理)。AIGC被定位为“概念辅助与方案分叉”工具:在每一历史阶段先由教师给出史料边界与禁忌清单,再由学生通过提示词约束生成多个方向,最后以人工再设计完成风格校准与版式控制,确保输出可读、可证、可交付。为保证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语境理解—形式转译”的闭环,课堂以“命题卡+必选元素清单”的方式提供结构化输入,并配套典型图形参考与字体示例素材包;同时限定练习节奏(60—90分钟完成草图/线稿),强调对“时代风格—设计语言”转化能力的考察,而非精细制作本身。

在1949—2000年书籍设计风格教学中,课程

以“阶段特征—视觉语法—当代表达”组织内容,并通过三个具体命题将抽象的历史分期落实为可执行的设计任务:其一,“火红的篇章——建国初期的理想主义叙事”(1949—1978),围绕革命美学与政治宣传语境,要求学生在封面中调用红/金主色、典型政治符号(如红旗、齿轮麦穗等)与对称式构图,并在虚构书目(如农业合作化纪实、雷锋日记选读、工业英雄谱)中任选其一完成主题化叙事;其二,“春潮与沉淀——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与多元”(1979—1992),强调从单一政治叙事转向信息载体与生活化表达,要求使用低饱和对比色、生活符号或抽象线条,并通过图文错位与网格意识呈现“松动感”;其三,“新潮与秩序——市场经济浪潮下的商业觉醒”(1993—2000),要求以撞色/渐变、摄影/具象符号与更具冲击力的版式组织体现消费文化与商业传播逻辑。在工具路径上,学生需结合AIGC与图像参考平台(如花瓣、站酷)完成概念生成、风格对照与元素搜集,并按统一交付规范完成“封面—书脊—封底”三联设计,控制在一张横板A3范围内导出JPG提交,以便形成可对比、可归档的过程与成果证据链。

课堂观察显示,AIGC显著提高了迭代速度,但也带来风格趋同与符号表层化问题:学生更容易依赖“主流推荐风格”完成时代感模拟,而忽视对叙事对象与符号语境的证据化论证,因而出现“形式合理但语义失配”的情况。针对这一风险,课程将评估标准从“好看”转向“可证据化叙事”,并将其具体落实到作业提交要求之中:学生除提交最终A3横板成品外,还需同步提交(或在设计说明中呈现)提示词结构、生成版本迭代、人工再设计修改点与依据,形成可审计的学习证据链;评价维度则以史实一致性(时代语境与符号母题是否匹配)、叙事清晰度(主题对象与阅读路径是否明确)、符号适切性(符号所指是否准确且不过度泛化)、跨媒介延展性(封面视觉是否具备后续数字传播与品牌化延展潜力)为关键指标,从而把AIGC“生成—筛选—再设计—交付”的流程转化为可复用的内容生产规范与评估框架。

广州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史与当代城市文化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其视觉传播需要完成从“政治记忆再现”到“当代文化识别与情感认同”的转换。书籍作为兼具信息与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媒介,其叙事结构与视觉表达承担着“组织历史材料—构建阅读路径—激发情感共鸣”的双重任务。面向青年受众,书籍化传播应强调“可读的微叙事”与“可

参与的延展机制”，使读者不仅理解历史，也能在互动中完成再阐释。

书籍叙事建模可从时间、空间与人物三个维度展开：时间维度以章节节奏与视觉层级组织“阶段—事件—精神”的递进关系，通过标题系统、信息密度与图文比例控制阅读推进；空间维度以广州红色地标、场馆街区与交通节点构成叙事载体，借助地图化构图与路径化阅读强化地域识别，并为线下到访、打卡传播与城市记忆再生产预留接口；人物维度以文献影像、家书与口述材料建立情感支点，以“可读的微叙事”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经验，增强共情与价值认同。面向青年受众，可参与的延展机制可将阅读转化为“认知—情感—行动”的连续体验<sup>[9]</sup>。建立“革命红×岭南在地色”的双层色彩体系，兼顾庄重性与城市气质；字体在榜书、报刊字与现代字体之间进行结构化重组，以形成可识别的标题语气与信息层级；版式以网格控制节奏与密度，为年表、地图、图注与史料标注提供稳定位置；图像采用“纪实+拼贴+插画化”的多层表达，并明确标注史料来源与再创边界，平衡历史可证性与当代审美接受度。虽然 AIGC 可嵌入概念生成、叙事组合与风格对齐等环节以提升效率，但仍需以人工把关叙事主线与价值表达，并通过提示词、版本迭代与再设计说明等可审计记录纳入质量控制，避免模板化叙事，确保规范可复用、效果可评估。AIGC 在书籍传播中的作用可被纳入三个环节：概念生成（关键词与方向分叉）、叙事建模（场景/符号/人物的可视化组合）、风格优化（参数化对齐色彩、构图与层级）。

### （三）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课程中的文化再编码

《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课程以“传统元素提取—调研分析—形式转译—综合应用”为学习路径，强调学生在真实设计任务中建立“从文化到视觉”的转换能力。课程前段以岭南传统文化为核心案例，引导学生识别并拆解地域符号的视觉构成与文化寓意：例如石湾陶艺、醒狮、广绣、岭南建筑花窗等，将其转化为可用于品牌视觉系统的纹样与符号单元，并要求在简化过程中兼顾“文化内涵保留”与“现代审美适配”。这一阶段的训练目标并非单次成品交付，而是形成可复用的符号提取方法与“视觉元素库<sup>[10]</sup>”的雏形，为后续主题化传播提供基础素材支撑。课程通过品牌调研任务把“文化元素的存在”转化为“文化元素为何被使用、如何被使用、是否被有效感知”的问题意识：学生

需从品牌基础、文化关联、用户偏好与竞品对照等维度筛选信息，并把零散材料转译为可视化结论与设计策略，从而避免传统元素停留在表层堆砌。种“调研—筛选—结论输出”的训练，使文化再编码不再是“看见符号就用”，而是以受众理解与传播场景为导向的策略化转译。课程后段进一步将符号库投入综合项目，要求学生以岭南非遗与城市文化符号为切入点完成资料分析、符号意义对照、草图推演与视觉系统化呈现；并明确强调从“是什么”转向“为什么”，即从外观特征走向文化根源与情感指向。该训练为红色文化的在地化表达提供一种“将红色叙事中抽象的精神价值，转译为可被识别与愿意分享的视觉语言”框架。

AIGC 的介入以新的方式理解并重组红色文化符号。AIGC 并未被定位为单一的图像生成工具，而是被纳入一套系统化的“文化再编码”实践流程，用以支持参与广州红色文化的在地化再创作。课程构建出“文化拆解—生成控制—语义校准—传播转化”的实践路径，使技术嵌入文化理解与设计判断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抽象精神价值到可传播视觉语言的结构化转译。围绕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展开文献与案例调研，对红色文化相关象征物进行梳理，并同步提取岭南地域视觉元素，如建筑花窗结构、醒狮纹样、木棉意象等。通过归类与结构分析，将相关元素划分为“空间—形态—情感”等层级，进一步建立“精神价值—视觉母题”的对应关系。例如，将“信念”转译为纵向挺拔结构，将“牺牲”对应为张力构图，将“希望”转化为上升趋势或光源意象。通过构建包含“对象—事件—时间—地点—风格—禁忌”等要素的提示词模型，引导学生在输入端明确历史语境与在地视觉语法，避免生成内容脱离广州地域文化特征。多轮对比实验中，学生对不同语义权重、风格设定与构图指令进行调整，并记录生成结果与问题修正路径，使 AIGC 从不可解释的“黑箱”转化为可分析、可优化的设计实验平台<sup>[11]</sup>。生成不再追求数量扩张，而强调控制能力与语义精准度的提升，AIGC 被界定为辅助性方法工具，而文化解释权与价值判断权始终掌握在人类创作者手中。因此，借助 AIGC 参与广州红色文化在地化再创作的路径模型为：文化拆解、提示词结构化、多轮生成实验、人工语义校准与跨媒介传播转化的递进式整合。该模型的价值不在于技术替代，而在于通过技术强化青年对文化符号的再理解与再组织能力，使叙事中的精神价值在广州在地视觉语法中获得当代表达，从而实现历史语境与数字媒介环

境之间的有效衔接。

### 三、课堂实践中的问题生成与机制线索

AIGC 技术进入高校视觉传达与文化设计课堂，重构图像生产流程，在实践层面显现出红色文化青年传播中的结构性问题。相较于将课堂经验视为教学方法的改进案例，本文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技术逻辑、文化表达与青年媒介行为相互作用的前端观察场域。通过对课堂作业生成过程、版本演化路径及讨论反馈的系统梳理，可以提炼出若干具有机制指向的问题线索，为后续模型建构奠定经验基础。

以提示词驱动和多版本输出为特征的 AIGC 显著降低了视觉生产的技术门槛，使学生在有限的绘图能力条件下即可迅速形成视觉方案，从而扩大参与规模并提升创作效率。但课堂观察显示，生产效率的提升并未同步转化为意义理解的深化，部分作品停留于形式生成层面，对红色文化所依托的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涵缺乏系统校准。

该现象表明，在生成效率加速的条件下，若缺乏明确的知识结构与语义核验机制，视觉表达容易趋于表层化。红色文化青年传播因此呈现出“生成能力”与“意义建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显示其问题属性并非技术层面，而是涉及认知机制与表达机制的协同关系。在相似提示语条件下，不同小组生成结果在构图方式、色彩倾向与符号使用上呈现出高度相似性，反映出生成模型在视觉风格上的算法偏好。这种趋同倾向易导致红色文化表达的模板化，使作品在形式上具备吸引力，却在语义层面削弱历史复杂性与价值指向。

对于具有明确政治象征与历史合法性要求的红色文化而言，视觉创新必须以文化准确性为前提。课堂实践表明，若缺乏在地符号约束与史实边界控制，生成机制将放大泛化风险。因此，有必要在生产机制之外引入规范维度与知识结构，以维持文化表达的稳定性与区分度。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年媒介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参与化与互动化特征。课堂中围绕红色主题展开的共创实践显示，学生更倾向于通过再叙事、系列化表达与互动设计完成意义理解，而非通过单幅作品或线性图文进行接受。这一变化意味着，传统以单向输出为主的传播模式难以适配青年媒介语法。视觉内容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同时也是身份表达与情感互动的媒介节点。由此，红色文化青年传播亟需回应“参与—互动—再传播”的链式结构，构建支持持续参与的表达机制。

### 四、课堂样本分析与结构变量提取

为避免模型建构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本研究在行动研究循环过程中，对三门课程的生成过程、作业成果与课堂讨论记录进行了结构化梳理。样本涵盖《标志设计》《书籍设计》《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三个课程班级，共计约 90 余名学生，形成阶段性视觉方案草图与定稿作品共计 260 余份。围绕 AIGC 参与路径，对提示词构建次数、生成版本迭代数量、语义修订记录与人工再设计比例进行课堂记录与对比分析，以此提炼影响红色文化青年传播质量的关键变量。

从生成行为特征看，AIGC 显著压缩了概念形成时间。在标志设计与书籍封面阶段练习中，单个命题平均可生成 5—8 个方向性方案，提示词平均修改次数约为 3—5 次。生成数量的增加扩大了学生对形式可能性的感知范围，提高了参与积极性与讨论密度。然而，对作品语义校准情况进行二次审阅时发现，约 60% 左右的初次生成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符号泛化现象，例如将“红色精神”直接等同为高饱和红色背景、抽象光芒或通用庆典构图，而缺少广州在地红色资源的具体指向；约 40% 左右的作品在历史语境匹配度上存在偏移，如时间线混用或人物母题泛化。

进一步对修订后作品进行对比，可以观察到当教师在中期评图环节嵌入“史料核验清单”与“语义对照表”后，超过 70% 的小组能够完成明显的语义修正与结构优化。生成机制本身并未自动提升历史准确性，而是在结构化知识嵌入后才显现出协同增效特征。该现象表明，AIGC 在红色文化视觉传播中的作用呈现出“效率强化—语义波动”的双重属性。

基于样本分析，本研究将课堂实践中反复出现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结构变量。

第一，生成效率变量。其表现为单位时间内可输出的方案数量与风格分叉能力。生成效率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参与门槛，增强青年对表达过程的控制感，但若缺乏语义约束，效率提升可能放大符号套用与风格趋同风险。

第二，语义校准变量。其核心在于历史语境、精神价值与在地符号之间的匹配度。语义校准通过史料阅读、对象限定与提示词结构化建模实现。当该变量被显性嵌入教学流程时，生成结果的准确度与叙事完整性显著提升；反之，则易出现“形式正确但意义空泛”的表达偏差。

第三，参与强度变量。其体现为学生在生成—讨论—再设计循环中的主动投入程度，包括提示词优化次数、版本对比深度与再设计幅度。课堂观察显示，参与强度越高，小组作品的文化辨识度与传播延展性越强。青年并非单纯接受算法输出，而是在反复比对与协作讨论中完成意义建构。

三个变量之间呈现出互动关系：生成效率扩大表达空间，参与强度决定空间利用程度，语义校准维持价值稳定性。当生成效率提升而语义校准缺位时，表达数量增加但文化深度下降；当语义校准嵌入但参与强度不足时，表达趋于保守，创新活力受限；唯有三者协同运行，方可实现“效率—深度—活力”的动态平衡。

由此可见，课堂实践并非简单展示 AIGC 应用效果，而是揭示出红色文化青年传播中“技术加速”与“意义建构”之间的结构张力。模型的提出并非抽象理论推演，而是基于上述变量互动关系的归纳结果。在此基础上，下一章节将对“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的三维协同结构进行系统阐释，以回应课堂样本所呈现的机制逻辑。

### 五、AIGC 赋能广州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三维协同结构模型

第三章所呈现的课堂实践表明，AIGC 介入红色文化视觉传播并非简单的工具替换，而是在生产效率、文化表达与青年参与之间引入新的结

构张力。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显著扩展了视觉探索路径，使青年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向方案生成；另一方面，算法生成依赖统计分布与模式复现，其结果易出现语义漂移、风格趋同与符号泛化，进而影响红色文化表达的历史深度与在地识别度。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是否介入，而在于如何在技术效率、文化合法性与传播有效性之间建立稳定结构。缺乏系统框架的技术应用，可能放大表达偏差；而过度强调规范约束，则可能抑制青年参与活力。因此，有必要在价值基础、生成机制与制度规范之间构建协同关系。

在理论层面，红色文化具有明确的历史真实性与价值导向，其视觉表达承担着意义建构与身份认同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则体现为概率模型驱动的技术逻辑，擅长多方案扩散与跨媒介迁移，但本身不具备历史判断与伦理自觉。青年媒介行为的参与化、互动化特征进一步放大了上述张力<sup>[12]</sup>。三种力量的交汇，构成 AIGC 赋能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结构场域。

三本研究提出的三维协同结构模型并不是一个线性操作流程，而是一种由多个功能维度共同构成的协同结构。三者分别承担意义基础、效率动力与规范调节功能，并在互动中维持系统运行的平衡。红色文化视觉传播必须建立在真实史料、历史语境与精神价值之上。视觉表达不仅需要呈现革命记忆，也应体现地域文化的在地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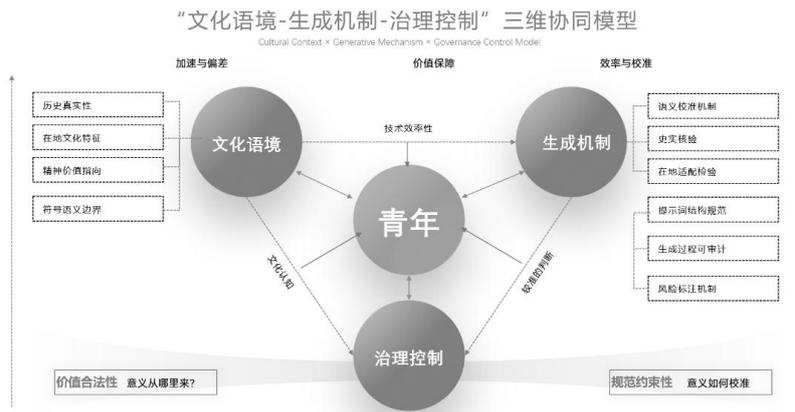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三维协同模型

该维度通过确立史实边界、构建“历史对象—精神内涵—视觉母题”的对应关系，并强化在地符号识别度，为生成活动提供意义框架。在三维结构中，文化语境决定传播内容的方向与深度，是生成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

提示词驱动、多版本生成与跨模态迁移显著提升了视觉探索效率，并拓展了表达的可能性空间。该机制降低了创作门槛，同时增强了青年参与的广度。由于生成过程依赖统计分布，输出结果易强化主流审美与既有模式。在红色文化语境

中，若缺乏结构化引导，生成机制可能削弱历史复杂性。因此，其运行必须嵌入文化语境约束与治理控制之中，形成受限扩展的表达结构。治理控制并非事后审查，而是与生成机制同步运行的动态调节结构，其作用在于维持技术效率与文化合法性之间的平衡<sup>[13]</sup>。文化语境为生成机制提供语义输入与价值边界，生成机制为文化表达提供形式扩展与参与空间，治理控制对全过程进行调节，防止表达偏离历史真实性与伦理底线。三者共同形成“价值—效率—规范”的动态平衡结构。当任一维度弱化时，系统运行将出现失衡，进而影响传播效果与文化表达的稳定性<sup>[14]</sup>。

该模型在三个层面拓展了相关研究（图1“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三维协同模型）：其一，在红色文化传播研究中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变量，将技术逻辑纳入价值表达分析；其二，在AIGC应用研究中强调文化合法性与制度规范，避免技术决定论；其三，在青年传播研究中，将参与式媒介行为嵌入生产—表达—治理的协同结构之中。“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的三维协同结构，既是对课堂实践经验的理论升格，也是对AIGC赋能广州红色文化青年传播路径的系统回应。

## 六、模型的实践转化路径与规范边界

视在第三章所揭示的“参与与门槛下降与理解深度不足”的结构张力，实质上反映出红色文化视觉传播仍停留在经验化生产层面。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视觉内容若仅被理解为单次图像输出，则难以支撑稳定的意义建构。三维协同模型的实践转化，首先体现为生产逻辑的范式转型，即由“个体经验驱动”转向“结构化知识嵌入驱动”的生成系统<sup>[15]</sup>。

在此框架下，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不再作为零散素材进入设计流程，而需被编码为具有层级关系与语义关联的视觉知识结构。具体而言，可构建包含四个维度的结构体系：其一为对象维度，涵盖革命遗址、历史人物与重要事件；其二为语义维度，明确精神内涵与价值指向；其三为风格维度，整合岭南视觉传统与历史图像资源；其四为场景维度，匹配展陈、导视系统与社交媒体传播等应用情境。

当视觉资产完成结构化编码后，AIGC生成机制方能在明确语义边界内展开多版本扩散，实现“限定条件下的表达创新”。由此，生成活动由偶发性的创意产出，转化为“生成—测试—校准—

再生成”的循环系统。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在制度层面嵌入知识约束，使技术效率与文化深度之间形成可持续平衡。从单次作品到生成系统的转变，实质上是红色文化视觉生产逻辑的结构重组，是对算法趋同与语义漂移风险的制度化回应。

模型的“传播维度”强调青年在传播链条中的角色转化<sup>[16]</sup>。课堂观察显示，青年更倾向于通过再创作与互动参与完成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而非停留于被动接收。AIGC支持多版本输出与跨媒介适配，使宏大叙事能够拆解为微叙单元，从而匹配社交平台的传播语法。广州地域文化符号（街景、方言字体、工运图像）与红色主题形成“熟悉感—历史感”的双重锚定，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并强化情感连接。这种双锚定机制，使价值表达不再依赖宏大阐释，而通过在地化语境完成意义内化。由此，模型在传播维度上实现了“青年参与—情境认同—再传播扩散”的结构闭环。

课堂实践中所显现的史实偏差、语境错配与风格挪用问题，表明若缺乏制度嵌入，技术效率可能侵蚀文化表达的严肃性。因此，三维协同模型的稳定运行，有赖于规范维度的结构化建构。确立“人机协同”的责任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仅承担形式生成与路径扩展功能，历史阐释与价值判断必须由具备专业知识的设计者或研究者完成。技术并不替代主体判断，而是在主体控制下提供方案空间。提示词结构、版本迭代路径与图像来源记录应纳入生成档案，以增强表达过程的透明度与审计性。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责任划分，也为后续效果评估与模型优化提供数据基础。在评价体系中嵌入史实一致性、语义适切性与版权合规性指标，使创新行为始终处于制度边界之内。

通过制度嵌入，三维协同模型形成“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使红色文化视觉传播在技术加速环境中保持价值稳定性与表达活力。

## 七、反思与展望

本研究以课堂实践为观察场域，通过过程记录、文本分析与生成路径梳理提炼模型结构。然而，其样本来源具有情境属性，尚未充分纳入真实传播环境中的组织协同、平台算法与量化反馈机制，传播效果验证仍以过程性证据为主，不同模型输出差异亦未形成系统比较。

未来研究可从机制层面深化：其一，构建红色文化视觉知识图谱并嵌入生成流程，强化历史—

致性与语义精度；其二，建立面向生成链条的审计框架，比较不同提示策略与模型结构对价值表达稳定性的影响；其三，探讨地域视觉知识与青年媒介语法的耦合机制，提升在地表达的差异化能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更新模型与加速内容生产的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的关键已经不再只是媒介更新，而更多体现在传播结构与表达机制的重构。唯有在文化语境、生成机制与制度规范之间形成稳定协同，方能实现持续的意义生产与认同建构。

#### 参考文献：

- [1] 杨春梅.高校翻转课堂的有效翻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04:231.
- [2] 刘晶鑫. AIGC 赋能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24,2(08):143-145.
- [3] 吕星月,何琳,童雅熙.叙事结构理论视角下红色文献数字叙事特征及其传播效果[J]. 图书情报工作,2026,70(02):41-53.
- [4] 龚昕悦,白丹. AIGC 时代下数字绘画基础课程的内容重构、方法创新及教改策略[J]. 美术教育研究,2025,(21):128-130.
- [5] 严璐璐,程聪,郭长伟.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性的矛盾张力与治理研究[J]. 科学学研,2026,44(02):315-324.
- [6] 金二威.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数字化构建及优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6,46(03):40-46.
- [7] 覃晴,罗梦舟.人工智能时代电影美学的嬗变[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5,(12):21-29.
- [8] 王斌,董筱.数字技术赋能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符号的活化传承:从静态保护到创新转化的路径研究[J].民族艺术,2025,(06):103-112.
- [9] 刘东.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逻辑探析[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24(06):25-33.
- [10] 杨艺贞.厦门花砖视觉元素提取与设计应用研究[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4(01):119-126.
- [11] 孙波.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打开未来智能教育“黑箱”的钥匙[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28(04):3-4.
- [12] 程瀚.从技术赋能到制度重构: 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3): 82-90
- [13] 黄子扬, 傅玄, 赵佳佳. Research on AIGC-Integrated Desig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Teach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AM and TPACK Models[J]. Sustainability, 2025.
- [14] 王伟文. Analysis of AIGC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us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5, 9(2):264-268.
- [15] 刘佳宁. AIGC 赋能四川高校红色文化教育: 问题研究与路径探索[J]. 发展教育学, 2025, 6(9).
- [16] 王群壹. 新媒体融合与 AIGC 赋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J]. 2025,6(11).